评《清代东北史》

赵中男

东北是清代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区域，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与关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许多与关内相同的东西，但同时也有许多与关内不同的东西。清朝对东北的汉人和蒙古人的统治政策，是清代民族问题的重要方面，这一政策的变化反映了满族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两次鸦片战争对东北有着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些影响无疑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缩影；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疯狂掠夺,侵占中国的财富与土地、最终导致两国为此而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开战，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世界近代史上腐败落后的封建王朝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典型事例；辛亥革命在东北的展开与失败，是整个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它同样向人们展示了在封建势力相对强大的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是何等不易。

另一方面，清代的东北有许多独具特色的东西。如清入关后，针对东北民族分布的具体情况，实行了民户州县制、驻防八旗制、边民姓长制和东蒙盟旗制四种几乎是同时并行的统治制度，可谓清初东北政治统治的一大特色。再如清帝的东巡（至山东祭孔除外），是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独特的制度，其中每次东巡，几乎都有重大背景，不是取得平定内乱的重大胜利，便是完成重大的文化成就。其中康熙帝的东巡颇为著名，他在沿途接见蒙古王公，召见在任和退休的文武官员，蠲免赋税，周览边疆的山河形胜，考察地方，检阅八旗水师，并筹画抗击沙俄、巩固边防的大计。因此，清帝的东巡是独具特色的政治性巡游。又如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及其实施效果，更是清代东北不同于关内的东西。清廷为了垄断东北地区，长期实行了对东北的封禁政策，但最终被迫开禁，反映出东北地区在内地人民不断出关浪潮冲击下，政治、经济、文化与关内的不平衡性日益缩小的趋势。作为《清代东北史》的第一个读者，这是我的一部分印象。

纵观全书，觉得它在内容上有三个特点：

其一，材料丰富，翔实，全面叙述了整个清代东北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不同于关内的独具特色的东西。书中叙述清朝皇帝的东巡，列表统计了清帝的十余次东巡活动；平定布尔尼叛乱一事，从叛乱的爆发、平定,到平定叛乱后的善后活动，书中都作了较为详尽的交待；清廷对东北实行的长期封禁政策，从厉行封禁到全面开禁，从建立柳条边到禁中有弛，这一政策造成的恶果——延缓了东北地区开发的进程，汉人进入东北边疆受到严格的限制，边疆少数民族以渔猎为主的落后状况受到清政府的保护而很少变化，客观上利于沙俄的侵略，这一切在书中都有详细的叙述；其他的如日俄侵略东北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东北的农业、手工业、城镇商业、与内地的贸易、不平等的进出口贸易、近代初步发展的东北民族工业、东北的金融货币，东北的文化包括入关前的民俗宗教、建筑、绘画、鸦片战争前的流人文化，鸦片战争后新式教育的创办，文化设施与新闻出版状况，作者无不在书中用丰富的材料加以叙述。这些材料为人们了解和进一

步研究清代东北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其二，作者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清代东北的许多问题加以梳理、研究，得出了许多公正、深刻的结论。汉人对后金的反抗斗争，不仅有下层人民，还有投降后金的上层将领，作者指出这种反抗斗争是反抗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实质是反对落后奴隶制的斗争；袁崇焕杀毛文龙一事，人们评价不一，作者则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尽管袁崇焕处理皮岛善后事宜有不足之处，然而从关内关外总的形势来看，对后金的防御力量是比以前加强了；评价清帝东巡，除指出其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外，书中指出每次东巡都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活动，仅护驾军队即达数万乃至十余万，沿途的道路、桥梁、行宫要征用大批民伕重新修整，庞大的巡行队伍，沿途必然骚扰，因此，每次东巡虽然减租免赋，但对于沿途的百姓来说，仍然是一场灾难；在封禁与反封禁问题上，作者认为，关内特别是山东、直隶、河南等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人口猛增、封建剥削和自然灾害的驱迫下，向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的东北地区流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趋势，并必然与清朝的封禁国策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封禁与反封禁的斗争构成为有别于关内地区的一种特殊形势的阶级斗争；在评价太平天国时期东北农民起义的作用时，作者指出，这些起义是在南方的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爆发的，它将大批清军牵制在关外，并且迫使清廷将关内清军北调，减少了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从而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起义军横扫白山黑水，使柳条边的边门和封禁长期陷于瘫痪，为流民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开发；在论述日本“满铁”和关东州都督府在侵略我国东北的作用时，书中指出，两者在性质、地位、职权等方面有所区别，“满铁”是日本总管对我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关东州都督府则是日本政府对我国辽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中枢，两者紧密关联，相辅相成，构成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进行侵略、掠夺活动的两大支柱；在评价清末的“新政”时，作者指出，“新政”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影响、控制进一步加强和国内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对立物，同时也反映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甘沉沦、欲图振作，又不愿放弃封建特权的矛盾心理。“新政”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清朝推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挽救陷于危机的封建统治，消解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新政”往往徒具虚名，并且“新政”伴随着清政府和各级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从而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和社会动乱，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论述清政府的金融业时，作者指出，清朝官、私银行业的发展，并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银行那样，是由于工业生产的结果，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在华贸易的发展，清政府财政的需要，以及内地财富集中于沿海口岸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下，许多官僚们觉得投资工业、不如进行银行投资业更为有利所驱使。从而在中国就产生了清官府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以及私人资本的清代畸型的银行业，显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银行业。

其三，作为一部断代地方史，书中将东北从时间、空间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时间断限上，不是以1840年为断限，将清史与近代史截然分开，而是从明末清国建立至1911年清朝灭亡，跨越了近代史的断限来叙述整个清代东北的历史；空间上，书中不限于今天意义上的辽、吉、黑东北三省，而将东三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的蒙古地区也包括进去，因为东三盟与东三省地理毗连，关系密切，而且在清末及其以后大部分相继改隶为东三省的州县。因此，此书是一部全面反映清代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综合发展过程的断代地方史，并非一般的地理沿革史、制度变迁史、革命斗争史、外国侵略史、民族发

展史可比。事实上清代东北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如封禁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四种统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城镇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反抗俄、日、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思想文化的变迁等等，都不能用1840年为断限，将它们截然分开，也不能将东三盟排除于这些问题之外，从而割裂这些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完整性。《清代东北史》这种将东北在时间和空间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方法和方式，为其他的断代地方史的研究和著述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先例。书中五章的内容，也基本上是围绕东北的整体结构来安排的，前三章主要是从政治上叙述清代东北的历史进程，从清政权的建立直至清王朝的灭亡，其中包括明清战争、抗击沙俄、多种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东北范围内）、封禁东北、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及辛亥革命在东北等重大内容；后两章将清代东北的经济和文化单列出来，结合当时国内外的社会背景加以叙述。这样的章节安排既便于人们了解整个清代东北史的全貌，又便于人们以此为线索进一步研究清代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此书的下限截止于东北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前夜，叙述了军阀张作霖勾结官府绞杀辛亥革命，用爱国志士的鲜血换取了更高的官职，并叙述了东北出现军阀统治的某些社会原因，因此，本书对于研究清末奉系军阀的兴起和发展，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的六位作者都是多年从事清史研究的专家，但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和擅长的领域。他们的写作分工则基本上与他们的专长相吻合：李燕光、徐恒晋先生负责清入关前部分；杨余练负责清入关后的东北部分；冯年臻负责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的东北部分；王革生这位清代东北经济问题的专家负责相应的部分；曾著《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的张玉兴先生则负责清代东北文化部分。作者们在分工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专长，同时又在现有的条件下吸取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清代东北史的研究成果。

令人惋惜的是，此书的主编杨余练先生在将整理完毕的书稿交付出版社之后，便猝然长逝了！其后张玉兴先生按出版社的意见继续修改此书，终于完成了杨余练先生未竟的事业。在《清代东北史》一书出版之际，谨向我所尊敬的先辈、清史专家杨余练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此书的问世不仅是我国清史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对杨余练先生的最好告慰。

（上接第117页）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中村哲夫的《关于清末地方习惯的调查报告》（《布目论集》），泽谷昭次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地方志》（《东亚经济研究》五一——三、四），等等。此外，市古宙三监修、冢濑进编集的《近代日中关系史论文目录》（龙溪书舍）则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和日本史研究者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有益工具。

（**说明**：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00编第5号《1990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其中中国的明清部分和近代部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系由张士阳和饭岛涉分别撰写。考虑到清史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翻译时去前舍后，只摘出有关清史的内容，但仍分为“清”与“近代”两部分，以存原貌。）